

人文之中：文中子的中国观

张 沛

中国传统蒙学经典《三字经》于孔孟道统之外标举诸子五人：“五子者：有荀扬，文中子，及老庄。”其中“老庄”指老子、庄子，“荀扬”谓荀子、扬雄，而“文中子”即隋代大儒王通之号。

王通字仲淹，生于隋开皇四年（公元584年），隋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（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）人。其先为太原祁人，后因永嘉之乱，随晋室南迁，侨居江左。王通六世祖王玄则，仕宋历任太仆、国子博士，人称“王先生”；五世祖王焕，曾任江州刺史；四世祖王虬因南齐萧道成代宋，于建元元年（魏太和三年，公元479年）奔至北魏，任并州刺史，始家河汾；三世祖王彦曾任同州刺史，因北魏永安之变¹，退居河曲；祖父王一²，曾任济州刺史；王通父王隆，隋开皇初曾以国子监博士待诏云龙门。王通少年早慧，“十五为人师”（9.5）³，仁寿元年（公元602年）秀才高第，次年任蜀郡司户书佐、蜀王侍读。仁寿三年初春，赴长安上隋文帝《太平十二策》（8.26、10.21），未被任用遂归。自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起，居乡著述讲学，以九年之功续成《六经》（又称《续经》），世称“河汾之学”。此后朝廷与地方（杨玄感）数次征召，均辞不就。大业十三年（公元617年）五月甲子病逝于家，门人私谥曰“文中子”（《文中子世家》）。

王通歿后，《续经》湮灭无闻⁴，仅《元经》与《中说》传世。《中说》一名《文中子》，原为王通门人问学记录⁵，由胞弟王凝整理成书，王福畴（王通第三子）编为十卷（时在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三年，即公元645-649年之间），而后刊行于世⁶。今本《元经》系后人伪作，不足为信；《中说》虽有窜乱，大体尚真⁷，《续经》之义、河汾之学犹可得而闻焉。故“文中子”一名有三义：一曰王通其人（文中子）；一曰《中说》其书（《文中子》）；一曰河汾之学（如《续经》之具见《中说》者）。本文即以《中说》为蓝本，由此而论“文中子”之中国观。

上篇

《续经》为王通平生最大著述，包括《礼论》、《乐论》、《续书》、《续诗》、《元经》、《赞易》六种。《续经》既成，王通感慨陈言：

甚矣，王道难行也！吾家顷铜川六世矣，未尝不笃于斯，然亦未尝得宣其用。退而咸有述焉，则以志其道也。盖先生（按：此言其六世祖王玄

¹ 魏武泰元年（公元528年），胡太后鸩杀明帝，尔朱荣起兵，杀胡太后、幼帝元钊及王公臣民二千余人。永安三年（公元529年），庄帝诛杀尔朱荣。（《魏书·帝纪第十·孝庄纪》、《魏书·列传第六十二》及《北史·列传第三十六》）

² 一说名杰，见司马光《文中子补传》：“彦生杰，官至济州刺史。”（邵博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四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8页）

³ 前为《中说》卷数，后为章数；下引同此。

⁴ 唐人言《续经》多语焉而不详，想是未见其书。北宋司马光称“今其六经皆亡”（《文中子补传》），已有定论；然而此后张耒又称“读通所著《续经》”云云（《答李文叔为兄立谥简》），又似其书尚在。未审二者孰是，录此待方家考证。

⁵ 王凝曰：“夫子得程、仇、董、薛而《六经》益明。对问之作，四生之力也。”（10.28）杜淹告王凝：“昔门人咸存记焉，盖薛收、姚义缀而名曰《中说》。”（《王氏家书杂录》）阮逸《中说序》：“《中说》者，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，薛收、姚义集而名之。”《文中子世家》：“（王通）寝疾七日而终。门弟子……丝麻设位，哀以送之。礼毕，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。”

⁶ 李翱曰：“其理往往有是而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，刘氏《人物表》、王氏《中说》、俗传《太公家书》是也。”（《答朱载言书》）是知《中说》中唐前已行于世。

⁷ 宋人邵博曰：“世传王氏《元经》、薛氏《传》、关子明《易》、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拟作。”（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五）清人李光地曰：“文中子《元经》都是假的，《中说》内有几条假的。”（《榕村语录》卷二十）

则)之述曰《时变论》六篇，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。江州府君(按：此言其五世祖王焕)之述曰《五经决录》五篇，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。晋阳穆公(言其四世祖王虬)之述曰《政大论》八篇，其言帝王之道著矣。同州府君(按：此言其三世祖王彦)之述曰《政小论》八篇，其言王霸之业尽矣。安康献公(按：此言其祖王一)之述曰《皇极说义》九篇，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。铜川府君(按：此言其父王隆)之述曰《兴衰要论》七篇，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。余小子获睹成训，勤九载矣。服先人之义，稽仲尼之心，天人之事，帝王之道，昭昭乎！”(1.1)

又其尝告弟子董常：“吾欲修《元经》，稽诸史论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皇极说义》焉。吾欲续《诗》，考诸集记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时变论》焉。吾欲续《书》，按诸载录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政大论》焉。”董常问：“夫子之得，盖其志焉？”曰：“然。”(1.2)是则《续经》非一人之作，实王氏六代继志戮力而成。

王通自云：“王道之驳久矣，礼乐可以不正乎？大义之芜甚矣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可以不续乎？”(2.33)又曰：“吾续《书》以存汉晋之实，续《诗》以辩六代之俗，修《元经》以断南北之疑，赞《易》道以申先师之旨，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，如斯而已矣。”(6.29)此其著述大旨。王氏以圣人自任，乃以《元经》拟《春秋》，每将二书并举。如其谓王凝：“汝为《春秋》、《元经》乎？《春秋》、《元经》于王道，是轻重之权衡、曲直之绳墨也，失则无所取衷矣。”(3.25)又称：

1. 《元经》天下之书也，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？征天命以正帝位，以明神器之有归，此《元经》之事也。(8.11)
2. 《元经》其正名乎！皇始之帝，征天以授之也。晋、宋之王，近于正体，于是乎未忘中国，穆公之志也。齐、梁、陈之德，斥之于四夷也，以明中国之有代，太和之力也。(5.47)

王通之“正名”，即正中国之名，以明中国之道。

考诸古籍，“中国”实具二义：一曰中国之地，一曰中国之道。中国之地，乃就四方而言之天下之中。如《礼记·王制》所称：

中国戎夷，五方之民，皆有其性也，不可推移。东方曰夷，被发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发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

中国之道，谓人文之中。如《战国策·赵二》记赵公子成语：

中国者，聪明睿知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艺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”

再如《法言·问道》设为宾主问答：

或曰：“孰为中国？”曰：“五政之所加，七赋之所养，中于天地者为中国。”

夷狄而行中国之道，则夷狄为中国；中国而行夷狄之道，则“中国亦新夷狄也”(《公羊传·昭公二十三年》)。是故中国之为中国，不在居中国之地，而在行中国之道。

行中国之道，在建人文之中。《易·贲卦·彖传》：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单襄公语：“忠，文之实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仁，文之爱也；

义，文之制也；智，文之舆也；勇，文之帅也；教，文之施也；孝，文之本也；惠，文之慈也；让，文之材也；……经纬不爽，文之象也。”再如孔子称尧：“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称周公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”（《八佾》）是知“文”因人而称，实即“人文”。按《易·说卦》：“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：“仁义礼智，人道具矣。”是“人文”与“人道”同义。人居天地之中，如《易传》所说：

1. 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：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（《系辞下》）
2. 天地设位，而《易》行乎其中矣。……乾坤，其《易》之缊邪？乾坤成列，而《易》立乎其中矣。（《系辞上》）

故“人道”又称“中道”。“圣人成之”，意同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（《易·贲卦·彖传》）；此圣王事业，即所谓“王道”。王通曰：“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，《元经》可不兴乎？”薛收曰：“圣人达而赏罚行，圣人穷而褒贬作。皇极所以复建，而斯文不丧也。不其深乎？”出告董常，董常曰：“仲尼没而文在兹乎？”薛收曰：“皇极所以复建，而斯文不丧也。”（1.8）秉持“斯文”，所以建有“皇极”。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皇极：皇建其有极。”孔安国传：“太中之道，大立其有中。”是知“皇极”即中道（大中之道），亦即“王道”。荀子曰“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”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荀爽曰：“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。”（《后汉书·列传第五十二》）王通则曰：“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。”（3.1）又曰：“礼其皇极之门乎？圣人所以向明而节天下也。其得中道乎？故能辩上下，定民志。”（6.26）居家不暂舍《周礼》，曰：“先师以王道极是也，如有用我，则执此以往。”（8.14）王通歿后，门弟子会议曰：“夫子生当天下乱，莫予宗之，故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正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修《元经》，赞《易》道，圣人之大旨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仲尼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《易》曰：‘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’请谥曰文中子。”（《文中子世家》）斯文在兹，故曰“文中”；人文之中，即是“中国”。王通以大中立言，为中国说法，此其所以为“文中”也。

下篇

自晋永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（公元290-589年），三百年间南北分立，中国不一。北朝为异族政权，史称“五胡乱华”；然隋乘魏、周之势统一中国，又为华夏正统，于是有“南北之疑”。王通自称“修《元经》以断南北之疑”（6.29），即在判定正统以为中国说法。判之之法，首曰“天命”：

1. 《元经》天下之书也，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？征天命以正帝位，以明神器之有归，此《元经》之事也。（8.11）
2. 《元经》抗帝而尊中国，其以天命之所归乎？（8.15）

王氏所说“天命”，非上天之耳提面命，如“天命玄鸟”、“昊天有成命”之类实称人德而言：

1. 子述《元经》皇始之事，叹焉，门人未达。叔恬（按：王凝字叔恬）曰：“夫子之叹，盖叹命矣。《书》云：天命不于常，惟归乃有德。戎狄之德，黎民怀之，三才其舍诸？”子闻之曰：“凝，尔知命哉！”（1.10）

按“皇始”乃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（公元396-398年）。皇始二年拓跋珪平灭后燕，统一北方。“天命不于常，惟归乃有德”引用《尚书·咸有一德》伊尹语：“天难谄，命靡常。常厥德，保厥位。……非天私我有商，惟天佑于一德；非商

求于下民，惟民归于一德。”又《大禹谟》：“皋陶迈种德，德乃降，黎民怀之。”施行仁政而得民心，此之谓“有德”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：

1. 或曰“苻秦逆”，子曰：“晋制命者之罪也，苻秦何逆？昔周制至公之命，故齐桓、管仲不得而背也；晋制至私之命，故苻秦、王猛不得而事也。其应天顺命、安国济民乎？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、背人而事纣，齐桓不敢逆天命、背人而黜周。故曰：晋之罪也，苻秦何逆？三十余年，中国士民东西南北，自远而至，猛之力也。”（4.12）
2. 子曰：“苻秦之有臣，其王猛之所为乎？元魏之有主，其孝文之所为乎？中国之道不坠，孝文之力也。”（4.13）
3. 董常曰：“《元经》之帝元魏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乱离斯瘼，吾谁适归？天地有奉，生民有庇，即吾君也。且居先王之国，受先王之道，予先王之民矣，谓之何哉？”（7.10）

“苻秦”谓前秦苻坚，“元魏”指北魏拓跋氏。孔子尝告弟子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又曰：“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王通称苻秦、王猛，犹孔子之许齐桓、管仲。“应天顺命、安国济民”、“天地有奉，生民有庇”，此王者之道，亦即中国之道。行中国道者，可为中国之主；主中国者，不必中国之人。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；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，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。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王通断南北而“帝元魏”、“尊中国而正皇始”（10.9），遥契孔孟之心。

宋儒严夷夏之防，故于王通之帝元魏不无訾议。如欧阳修曰：“夫帝王之统不容有二。而论者如此，然缙绅先生未尝有是正之者，岂其兴废之际，治乱之本难言与？……文中子作《元经》，欲断南北之疑也，绝宋于元徽五年，进魏于太和元年，是绝宋不得其终，进魏不得其始。”（《原正统论》）南宋林夔孙更称：

《玄经》（按：即《元经》）尤可疑。只缘献帝（按：当为“献公”之误）奔北（按：奔北者为“穆公”，即王通四世祖王虬），便以为天命已归之，遂帝魏。（《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·战国汉唐诸子》）

后人曾有辩驳，如明代郑晓以为：“《春秋》谨华夷之辨，中国有主也。文中子帝元魏未为非。”（《今言》卷一）清人钱曾曰：“《春秋》抗王而尊鲁，《元经》抗帝而尊中国。文中子之孝文犹帝魏也，殆夫子之遗意欤？宋儒高谈性命，不达经权数百年来抹略其书，无有扬之如司空表圣、皮袭美其人者，可不叹乎！”（《读书敏求记卷三·元经薛氏传十卷》）清人李慈铭亦曰：“夫通生于元魏，不帝魏而将谁帝乎？且舜生东夷，文王生西夷，然则舜与文王亦当绝之中国乎？”（《越缦堂读书记·集部·别集类·升庵集》）盖时势有异，故立论不同。此且不言；王通岂真“绝宋不得其终，进魏不得其始”乎？按宋“元徽五年”（公元477年）即魏太和元年，是年萧道成废刘昱，两年后齐代宋立。王通自云：“晋宋之王，近于正体，于是乎未忘中国，穆公之志也。齐、梁、陈之德，斥之于四夷也，以明中国之有代，太和之力也。”此其所以“绝宋于元徽五年，进魏于太和元年”。再如王通因穆公奔北而帝魏之说，亦不尽不实。《中说》载录：

1. 子之家庙，座必东南向，自穆公始也，曰“未忘先人之国”。（4.16）
2. 裴晞问穆公之事，子曰：“舅氏不闻凤皇乎？览德晖而下，何必怀彼也？”叔恬曰：“穆公之事，盖明齐魏。”（7.17）

所谓“明齐魏”，即“明中国之有代，太和之力也”。王通又云：

1. 太和之政近雅矣，一明中国之有法。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！（5.12）
2. 孝文没而宣武立，穆公死、关朗退，魏之不振有由哉！（10.1）

穆公之奔魏，盖“览德晖而下”，然“未忘先人之国”；王通之帝元魏，盖“太和之政近雅矣，一明中国之有法”，然又惜其“不得行穆公之道”，以为“信美”而“未光”（7.6）。王氏之家国情怀如此。可知王通之帝元魏，初不在穆公北奔，实以大中为心而不得不然：

1. 薛生曰：“殤之后，帝制绝矣，《元经》何以不兴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帝制，并心一气以待也，倾耳以听，拭目而视，故假之以岁时。桓、灵之际，帝制遂亡矣；文、明之际，魏制其未成乎？太康之始，书同文、车同轨，君子曰‘帝制可作矣’，而不克振。故永熙之后，君子息心焉，曰：‘谓之何哉？’《元经》于是不得已而作也。”（5.50）
2. 董常曰：“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主中国者，将非中国也。我闻有命，未敢以告人，则犹伤之者也。伤之者，怀之也。”董常曰：“敢问卒帝之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贵其时，大其事，于是乎用义矣。”（7.10）
3. 叔恬曰：“敢问《元经》书陈亡而具五国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江东，中国之旧也，衣冠礼乐之所就也。永嘉之后，江东贵焉，而卒不贵，无人也。齐、梁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。及其亡也，君子犹怀之，故书曰‘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亡’，具五以归其国，且言其国亡也。呜呼，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！”叔恬曰：“晋、宋亡国久矣，今具之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衣冠文物之旧，君子不欲其先亡；宋尝有树晋之功，有复中国之志，亦不欲其先亡也。故具齐、梁、陈以归其国也，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。”曰：“中国之礼乐安在？其已亡，则君子与其国焉？”曰：“犹我中国之遗人也。”叔恬曰：“敢问其志。”文中子泫然而兴曰：“铜川府君之志也，通不敢废。书五国并时而亡，盖伤先王之道尽坠。故君子大其言，极其败，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。‘期逝不至，而多为恤’，汝知之乎？此《元经》所以书也。”（7.13）

《元经》“天下之书”（8.11），王通于此为大中立言，故属意江东而不得不尊中国，伤怀南土而不得不帝元魏。苦心孤诣，岂“弃亲昵而媚豺狼，悖逆至此”（章太炎：《菟汉微言》）¹一语可以了得！叶适谓其《续经》“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”（《水心别集卷八·王通》），王阳明言其“良工心独苦”（《传习录·上》），近人汪吟龙亦曰：“推文中子之用心，曷尝一日忘中国哉！《元经》之作，实具苦心。”（《与章太炎论文中子书》）²皆可谓解人知言。

附论：

有宋一代，文治远胜武功，此史有定论。其时中国积弱，强敌环伺，于是宋儒大夷夏之防，以求自振³。王通断南北之疑，正皇始而帝元魏，其不为宋儒所喜，自是意料中事。然宋儒又奉之为道统中人⁴，几乎众口一词，如宋初柳开宣

¹ 章氏感激时事，故有此说；然其厚诬古人，实不足为训。

² 汪吟龙：《文中子考信录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3年，第96页。

³ “自振”兼自认（self-identification）与自张（self-assertion）之意。西方哲人称为政要在分别敌我（参见卡尔·施米特：《政治的概念》，刘宗坤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06-107页），宋儒严华夷之辨用意正同。

⁴ 以文中承接儒家道统，始自晚唐皮日休。如其曰：“夫孟子、荀卿翼传孔道，以至于文中子。”（《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》）又曰：“复乎千世，而可继孟氏者，复何人哉？文中子王氏，讳通……较其道与孔孟，岂徒然哉！”（《文中子碑》）然文中子道统地位之底定，实在宋代（说见下）。

言：

1. 隋之时，王仲淹于河汾间，务继孔子以续《六经》，大出于世，实为圣人矣。（《补亡先生传》）
2. 昔先师夫子，大圣人也……厥后寝微，杨墨交乱，圣人之道复将坠矣。……孟轲氏出而佐之，辞而辟之，圣人之道复存焉。……孟轲氏没……再生扬雄氏以正之，圣人之道复明焉。……扬雄氏没，佛魏隋之间，讹乱纷纷……重生王通氏以明之（下略）。（《答臧丙第一书》）

稍后“宋初三先生”之孙复、石介声称：

1. 吾之所谓道者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也，孟轲、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之道也。（孙复：《信道堂记》）
2. 传曰：“五百年一贤人生。”孔子至孟子，孟子至扬子，扬子至文中子，文中子至吏部……其验欤？（石介：《上赵先生书》）

朱熹虽谓文中“其学之不足以为周、孔”，然又云：

1. 荀卿之学杂于申商，子云之学本于黄老，而其著书之意，盖亦姑托空文以自见耳，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也。（《王氏续经说》）
2. 邹汾（按：即孟子、王通）断简光前载，关洛（按：即张载、二程）新书袭旧芳。（《抄二南寄平父因题此诗》）

是亦推许有加¹。同时提倡事功之陈亮，史称“其学自孟子之后惟推王通”（《宋史·列传第一百九十五·儒林六》），朱熹曾言：“陈同父（按：即同甫，陈亮字）学已行到江西，浙人信向已多。家家谈王伯，不说萧何、张良，只说王猛；不说孔孟，只说文中子，可畏！可畏！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三）心学宗匠陆象山亦称：

由孟子而来，千有五百余年之间，以儒名者甚众，而荀、扬、王、韩独著，专场盖代，天下归之，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。（《与姪孙浚书》）

非特如此，宋代科考兼用策论，南渡之后尤以策论取士；据《宋史·选举志》载：

绍兴元年，初复馆职试，凡预召者，学士院试时务策一道，天子亲览焉。……凡应诏者，先具所著策、论五十篇缴进，两省侍从参考之，分为三等，次优以上，召赴秘阁，试论六首，于《九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七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扬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文中子》内出题，学士两省官考校，御史监之，四通以上为合格。

是则文中之学不但为士林所重，更列入国家考试经典。今以王十朋（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科状元）、陆象山（乾道八年进士）二人策论为例：

1. 后世有大儒王通者，鸣道河汾间，与弟子难答问，动以洙泗为法。《中说》十篇，犹孔氏《论语》也。（王十朋：《策问》）
2. 孟子之后，以儒称于当世者，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四子最著。（陆象山：《策问》）

犹可想见当时风习之盛。宋以积弱偏安之国而如此推重帝元魏之王通，岂非咄咄

¹ 李光地曰：“程朱身分高，又见得到，直眼大如箕。三代下所推者，不过几人：董江都、诸葛武侯、文中子、韩文公，余则称陆敬輿、郭汾阳。”（《榕村语录》卷二十二）可为旁证。

怪事？按儒家崇尚文德，以武功为次，所谓“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）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载禹征有苗，三月而苗民叛；舜敷文德，七旬而有苗格。孔子称之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又曰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；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（《季氏》）孟子亦曰：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所谓“文德”，即人文大中之道，说已见上。孔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斯文在中，是为“中国”。千百年来，其说深入人心¹。宋室偏安一隅而自居中国，根源在此。文中子为大中立言，宋引之为奥援，又何足为怪哉！

孔子论政，以为“民无信不立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言国家当取信于民。取信之方，“君子以为文，而百姓以为神”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，如“天命”、“五德终始”即是，“正统”、“道统”之说亦然；以今人视之，则无非当时之“国家（民族）意识形态”而已。国固不可无信，否则人心涣散，难免土崩鱼烂。虽然，国家欲取信于民，唯当以可信者信之，所谓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”（《礼记·大学》）；不可信而欲人信，甚且强人信从，则不过愚而暴而已，此又不必烦言也。

¹ 西人所谓“汉族文化中心主义”，参见费正清、赖肖尔：《中国：传统与变迁》第八章第一节。